

- 于滨
“西方主义”与中国外交的困境和前景
- 托马斯·芬加
中国的世界秩序观
- 傅梦孜
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外交与对华政策方向
- 樊高月
“海空一体战”：美国“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柱



外交觀察

FOREIGN AFFAIRS OBSERVER

主编 陈志实 | 副主编 韩 雪

- 汪铮
领导力、保障力、感召力：中国周边关系恶化的原因与对策
- 陈刚
气候变化——中国外交应对的非传统议题
- 2012年亚太双边关系
 - 葛来仪 白君莲
中美关系：权力交接过程中紧张升级
 - 詹姆斯·J.普里斯特
中日关系：40周年纪念？忘掉它吧！
 - 斯科特·斯奈德 卞仕元
中国—朝鲜半岛：领导层换届之后
 - 罗伯特·萨特 黄志豪
中国—东南亚关系：中国取得并推进南海成果
- 鲁宁
中国建构西太平洋海权突破口在东海

2013
春季号

总第2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外交觀察

FOREIGN AFFAIRS OBSERVER

主编 陈志实 | 副主编 韩 雪

2013
春季号

总第2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交观察. 2013 年. 春季号: 总第 2 辑/陈志实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097-4401-7

I. ①外… II. ①陈…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 IV. ①D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0711 号

外交观察 (2013 年春季号 总第 2 辑)

主 编 / 陈志实
副 主 编 / 韩 雪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 (010) 59367127 责任编辑 / 陈 帅 王 颖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责任校对 / 李 红
项目统筹 / 邓泳红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3.75
版 次 /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字 数 / 178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401-7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外交观察》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 滨 赵进军 黄 靖 傅梦孜

主 编 陈志实

副 主 编 韩 雪

编 辑 段修建 张 杞

编 务 简 单

支持单位 外交学院 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

网 站 [www. faobserver. com](http://www.faobserver.com)

序 言

进入 2013 年，中国自 2012 年以来与周边国家开始的海上边界争端不但没有冷却，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特别是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僵持，似乎很难见到柳暗花明的迹象。如何处理好当前中国外交所面对的困难，使中国的发展能够在和平的外部环境下延续下去，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将是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面临的重大外部挑战。

2013 年 1 月 28 日，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进行了第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他强调，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十分珍惜和平安定的生活。而在长期实践中，中国提出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和奉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向世界做出了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强调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这些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永远不能动

摇。但是，总书记也同时指出，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绝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绝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国家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由此可以看出，这将是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指导思想。

因此，《外交观察》本辑的主题是“世界秩序中的中国”。在复兴之路上的中国展现出的崛起姿态，很容易引致他国特别是中国周边邻国的疑虑和不安。那么，中国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中定位自己的角色，即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并如何拥有相应角色的话语权？本辑文章尝试探讨这些问题。文章中既有对中西方文化理念、秩序观念的宏观探讨，也有对中国与他国（特别是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外交困境及出路的分析。正如在《外交观察》第1辑的序言中提到的，我们希望通过《外交观察》，能够围绕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辅助决策者理解世界、地区或国家形势及国际关系发展的新趋势，获取质量优、水平高、角度新的研究成果，有效应对国外形势、环境变化对国家政策走向的影响，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和创新思想，以使中国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



目 录

“西方主义”与中国外交的困境和前景	于 滨 / 1
中国的世界秩序观	托马斯·芬加 / 33
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外交与对华政策方向	傅梦孜 / 69
“海空一体战”：美国“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柱	樊高月 / 92
领导力、保障力、感召力：中国周边关系	
恶化的原因与对策	汪 铮 / 112
气候变化——中国外交应对的非传统议题	陈 刚 / 125
2012 年亚太双边关系	/ 140
中美关系：权力交接过程中紧张升级	葛来仪 白君莲 / 142
中日关系：40 周年纪念？忘掉它吧！	
.....	詹姆斯·J. 普里斯特 / 158
中国—朝鲜半岛：领导层换届之后	
.....	斯科特·斯奈德 卞仕元 / 171
中国—东南亚关系：中国取得并推进南海成果	
.....	罗伯特·萨特 黄志豪 / 181
中国建构西太平洋海权突破口在东海	鲁 宁 / 192
附录	/ 205

“西方主义”与中国外交的困境和前景

于 滨 / 文



导读：对中国目前的外交困境有多种解读。本文试图以主导中西互动长周期的“西方主义”（Westernism）来解析中国外交的现状。“西方主义”是对西方主要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的描述，其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是以一个主要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来分解和应对复杂的政治世界。在“西方内战”期间（1618～1991年），各种西方思想流派均按自身价值判断寻求各自理论和实践的最高纯洁度（或极端性）。20世纪以来，中国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认同或借鉴了西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告别了西方主义中的极端成分，在传统与现代、国际化和中国化之间寻找自我并造福世界。然而，中西在理念上的碰撞由于中国日益强大和“非西方化”，以及西方“硬”实力相对下降而趋于尖锐。中国近期的外交困境，凸显了中西理念上的冲突以及中国话语权的缺失。

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外交上高调介入中国周边问题，军事上启动“海空一体战”（Air-Sea Battle），经济上加速建构排他性的“跨太平洋伙伴”体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借此“重返”

亚太。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的互动，似在由“战略互疑”^①和战略竞争，滑向战略防范以至战略对峙。与此同时，美国对华战略中对华遏制的冲动和成分都在增长。2008 年以来，西方金融危机加快了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的进程。中国实力的骤然增强，带来的却是外部环境的恶化。^②

国力强大与外交困境相伴是正常还是反常？中国国力的提升为何伴有话语权的缺失？中国势必要在“孤独中”崛起吗？^③中国的“和谐世界”观念为什么难以得到西方认同？如果说受利益驱动的西方可以勉强接纳但并不乐见一个经济强大的中国，那么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会在多大程度上容忍一个非基督教的、非西方式民主的、奉行独立外交和拥有独立核打击力量的非西方大国，还是一个未知数。

对于中国现阶段外交困境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五种截然不同的论点。

● 一是认为中国内部决策不力，透明度不够，加之贪官怨民和高涨的民族主义，使近期中国外交顾此失彼，外交资源的巨大投入与微量产出不成比例。以此开出的“药方”是“攘外必先安内”。^④

① 见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12 年 3 月。

② 王缉思：《中国的国际环境为何趋于严峻？》，《环球时报》2012 年 6 月 13 日。

③ 《社评：有点“孤独”是中国崛起的正常境遇》，《环球时报》2012 年 6 月 29 日。

④ 见王缉思《中国的国际环境为何趋于严峻？》，《环球时报》2012 年 6 月 13 日；Joseph Nye, Jr., “China’s Bad Bet Against America,” *PacNet Newsletter* 14, March 25, 2010,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pac1014.pdf>; Zhu Feng, “A Return of Chinese Pragmatism,” *PacNet Newsletter* 16, April 5, 2010,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pac1016.pdf>。“攘外必先安内论”中比较极端的一个观点认为，中日之间领土之争的根本痼疾是中国不是宪政民主国家（见张千帆《只有宪政民主才能改善中日关系》，<http://user.qzone.qq.com/622007780/blog>（转下页注））

• 二是外部尤其是美国因素所致。早在奥巴马执政初期，若干外交界元老（基辛格、舒尔茨等）就建议新任总统奥巴马更多地关注亚太。^② 而美国军方近期推出的“海空一体战”，则是由美国国防部在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领导下的“净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et Assessment）冷战结束以来一直把中国作为假想敌的最新版。^③ 由此可见，美国此轮“重返”亚太，起因是中国太强力、崛起速度太快，而非中国国内的“乱象”。另外，某些美国外交决策人士（如希拉里·克林顿）的政策取向，也在相当程度上使双边关系难上加难。^④

• 三是各说各话的“战略互疑论”，认为中美之间多年来广泛而深入的交往，双方非但未能建立对对方长远目标的信任，反而对对方的战略意图疑虑日增，而这又对双边关系具有“缓慢的破坏性”。^⑤

（接上页注④）#!app=2&via=QZ.HashRefresh&pos=1360236860）。在这个意义上，“攘外必先安内论”与西方国际关系中的“民主和平论”（democracy-peace theory）异曲同工，即在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中，非西方式民主国家必定是滋事和侵略的一方。然而“攘外必先安内论”和“民主和平论”都无法解释1949年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未有重大改变，却与众多周边国家解决了边境问题。

② Susan Glasser, “Head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the Blind Dissident, and the Art of Diplomacy in the Twitter Era,” *Foreign Policy*, July/August, 2012, www.foreignpolicy.com/2012/06/18/Head_of_State?page=full.

③ Greg Jaffe, “U. S. Model for a Future War Fans Tensions with China and Inside Pentagon,”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 2012.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us-model-for-a-future-war-fans-tensions-with-china-and-inside-pentagon/2012/08/01/gJQAC6F8PX_story.html.

④ 于滨：《希拉里与中美关系》，北京大学《观察与思考》2011年3月号，中道网，<http://www.zhongdaonet.com/NewsInfo.aspx?id=701>；Robert Ross, “The Problem With the Pivot: Obama’s New Asia Policy is Unnecessary and Counterproductive,”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2；Glasser, “Head of State,” *Foreign Policy*, July/August, 2012, www.foreignpolicy.com/2012/06/18/Head_of_State?page=full；“Debating Hilary,” *Foreign Policy*, June 20, 2012, 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2/06/20/debating_hillary.

⑤ 见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12年3月。

• 四是西方学界的中国传统文化“缺陷论”，认为中国与周边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等级观念，以及儒教文化中重关系（relationship）轻规则（rules）的传统。这使中国与邻国，包括中国的盟友和伙伴之间不可能建立平等和稳定的关系。^①

• 五是西方传统的地缘政治学认为中国的地缘环境与欧亚大陆的主要国家类似，任何国家实力的快速增长，势必招致邻国的疑虑和反制；这与中国国内的政体性质和社会环境毫不相干。相比之下，处于两洋和弱邻之间、地缘环境优越的美国则可坐山观虎斗，以逸待劳。^②

上述诸种论点从不同角度透视了问题的症结。然而中国目前的外交困境还有更深层文化和认知的因素。因此有必要在中西文明交

① 见 Thomas Fingar, “China’s Vision of World Order,” in Ashley J. Tellis and Travis Tanner, eds., *Strategic Asia 2012 – 13: China’s Military Challenge*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Seattle and Washington, D. C., 2012), pp. 343 – 373. 中文版见《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外交观察》2013 年春季号。Fingar 文中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学界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至少与西方文化一样具有侵略性的观点，见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Joanna Waley-Cohen, *The Culture of War in China: Empire and the Military under the Qing Dynasty* (London: I. B. Tauris, 2006)。与后者不同的是，Fingar 是从儒学的观念和依此衍生的政体为切入点，而 Iain Johnston 和 Waley-Cohen 则是以谋略和决策角度为依据。

与之持不同的“非主流派”观点的是 David Kang, “Hierarchy and Stabilit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63 – 189。Kang 认为中国传统对外政策确是以不平等观念为基础，但其超级稳定性则是以文化认同或服从和干涉内政为运行机制，即原则上不平等，但事实上高度自治。这与西方 1648 年以来的 Westphalia 国际关系截然不同，后者是原则上平等的主权国家，但实际操作机制则是以实力为基础的“丛林法则”。

② 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2.

流和碰撞的层面上提出和解析问题，进而为历史性崛起的中国在面对复杂和并非友善的外部环境时，提供一个可供继续探讨的话题和视域。为此，本文以西方开创和主导的国际关系的思想体系为切入点，试图以“西方主义”概念来描述西方自身发展以及与非西方关系的轨迹，以此解释西方政治行为中所表现的“分”（divide and separate）的常态，及其在观念和政策操作上与中国传统“和”的理念之不同。一个国力强大的中国能否与强势和统一的西方沟通、共存与合作，仍是中国知识和政治精英必须认真对待的课题。

一 西方世纪与“西方主义”

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而言，都极不寻常。在有形方面，人类驾驭、改造、超越和摧毁世界的能力空前发展；以和平（贸易）或非和平（战争）互动的能量得以急速提升。进入 21 世纪，世界不仅有高科技、互联网和全球化，也有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武器和先发制人战略在世界扩散的趋势；^①既有“老欧洲”的后现代主义出于对昔日殖民—帝国主义的反思所派生的细腻和复杂的多边主义，^②也有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的“文明冲突”。

① 先发制人战略见美国布什政府在 2002 年 9 月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policy/national/nss-020920.pdf>，2009 年 7 月 20 日。而俄罗斯的核战略也在 2000 年 4 月放弃了苏联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见 Jeanne L. Wilson, *Strategic Partners: Russian-Chinese Relations in the Post-Soviet Era*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2004), p. 200。如今，甚至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国纷纷放言，要对敌对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② Robert Kagan, *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Knopf, 2003)。

应该指出的是, 20 世纪虽然从西方的大规模“内斗”开始, 却以西方的“统一”而结束。西方自由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最终得以排除异己(德、日、俄), 整合四方, 以强力面对世界。与此同时, 经过 20 世纪西方各类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的剧烈冲撞, 西方已经确立了相对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并得以在世界范围推广。在 21 世纪, 西方会竭尽全力维护这一价值观的主导地位, 尤其是在 2008 年市场资本主义神话破灭之后。

西方对 20 世纪有多种定位。比较常见的是《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所谓的“美国世纪”(American century)。^① 也有从“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Pax Britannica)过渡到“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一说, 其交接点为查尔斯·金德伯格首创的“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②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 把西方自由主义与其对手西方共产主义的最后一战(冷战)描述成前者对后者的历史性胜利, 人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从而“终止”,^③ 这实际上以间接方式验证了美国军事史学家威廉·林德(William Lind)的“西方内战”(Western civil wars)一说。所不同的是, 林德把直到冷战结束为止的历史称为“西方内战”, 这不仅包括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 也包括 1618~1648 年三十年战争以后西方国家之间无休止的战事, 这当然也包括西方在广袤的非西方世界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

① 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② 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 - 39* (London: Allen Lane, 1973).

③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2)。福山的论点 1989 年首次发表于美国《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 summer 1989)。

战争。^①如果排除任何价值判断的成分，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实际上是属于“西方内战”一部分的“西方世纪”。

上述论点至少给人以两点启示。首先，战争是西方主导国际政治的主要方式之一，不管这些战争是以“冷”还是“热”的形式出现，不管是在西方国家之间还是对非西方国家。事实上，这个使历史“终结”的 20 世纪，也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在自公元 1000 年以来所有人类战争中死亡的 1.5 亿人中，75% 死于 20 世纪。^②林德“西方内战”的时空观高度浓缩了这段血与火的历史，不仅基于对历史大势的把握，更需要一些勇气。战争和杀戮古而有之，并非西方专利。然而战争的规模、频率、持久性和破坏力，却是与西方工业化和科学发展同步提升。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学者戴维·康（David Kang）对欧洲和东亚地区政治“长周期”的比较研究，结论是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疆界自公元 1200 年以后基本没有改变过。相比之下，1500 年欧洲的 500 个独立政体到 1900 年只剩下 20 余个。欧洲国家之间无休止的征战，使绝大部分独立的政治实体消亡。^③ 本文引用此例，不在于表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要“好于”欧洲的“丛林政治”，而在于表明中国与西方地区政治的互动形式和结果不同。

其次，在“西方内战”期间无休止的尚武行为背后，是各种西方思想流派按照自身逻辑和标准寻求理论和实践的最高纯洁度（或极端性）而进行的无休止的论战。19 世纪以来，西方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资本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

① 关于林德的观点，见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 No. 93 (Summer 1993), pp. 22–49.

② John Rourke and Mark Boye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n the World Stage*, Brief, 7th ed. (Columbus, OH: McGraw-Hill, 2008), p. 232.

③ David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3–7, 37–41.

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等，都得以充分发挥和激情表演，并在这个林德称之为“西方内战”的最后阶段（20 世纪）达到顶峰。在西方各种思想流派之间你死我活的交锋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非西方世界也被迫卷入其中并为之付出巨大代价。

这里，不妨把上述西方种种意识形态的表象和内涵定义为“西方主义”（Westernism）。西方主义流派五花八门，然而各自对事物因果关系的处理却惊人地相似，即以一个主要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来分解和应对复杂的以人为核心的政治世界。最通常的做法是围绕主、客观为基本自变量，衍生出无数解说和理论。以冷战期间的西方自由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制度上的代表美国和苏联为例。两者都以政治制度或经济基础的变量来解释国家的对外行为方式。尽管它们在理论上水火不容，实践中不共戴天，但面对一个拥有各种色彩和层次的“混沌”世界，美苏两国所开出的药方极为相似，即把复杂的国际事务划为黑白、善恶分明的两极世界，并按自身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改造和征服对方。“二战”以后，美苏都不愿意欧洲殖民主义延续，为此，美国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统一的自由贸易体制，而苏联则乐见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扩展。为了各自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以及公开或隐蔽的国家利益，美苏都难以容忍“第三条道路”，都在对外政策方面实行“有限主权论”（limited sovereignty）。美国以政变方式推翻智利的民选总统阿连德，苏联则把“布拉格之春”消灭在萌芽之中。西方主义在方法论上“从一而终”，意识形态上以“我”画线，在外交上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在这一点上，西方主义在各自意识形态方面的极端品性，与宗教原教旨主义强烈的排他性极为相似。

即便是在 21 世纪西方自由主义一手遮天的时代，后现代主义所派生出来的种种主义的极端性亦表露无遗：女权主义视男性为万

恶之源；极端环保主义视一切人工痕迹为大逆不道；反全球化主义对全球化所有载体（大公司、工业化国家聚会等）采取暴力抗争；等等。在美国，新保守主义寥寥可数的几位“秀才”不仅在20世纪80年代以“保守革命”整合美国，更在布什执政期间（2001～2008年）以强势的单边主义和极端放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搅乱世界。到奥巴马执政时期，共和党内以极端保守人士为主体的“茶党”，网罗了各路反政府、反纳税、反移民、反有色人种、反科学等势力，严重极端化了美国的政治生态。

二 中国与“西方主义”

“西方主义”伴随着西方工业化产生的巨大经济—军事能量而传向世界，对处于弱势的非西方世界具有极大的震撼力和感召力。从广义的视角，中国20世纪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关系走向，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认同了西方的三个主要思想和意识形态体系，即20世纪初的西方自由主义、“五四”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1979年以来的西方市场资本主义。然而，上述西方主义在中国都有“水土不服”的问题，最终也不同程度地被“中国化”。尽管如此，它们所折射出的中与西、新与旧等众多政治光谱，穿越了百年时空，至今仍在中国政治生态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现自身的价值和地位。

关于“五四”的讨论恐怕要永远继续下去。然而，无论今人如何在启蒙与救亡、人权与国权、保守与激进、改良与革命之间界定“五四”的历史意义，“五四”所完成的“转型”，在理论上仍然是在西方主义范式之内，即在中国内部政治的整合中，由西方自由主义向西方共产主义的转型。30年之后（1949年），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又在国际舞台上“一边倒”地选择了西方共产主义。此后，

中国外交在相当程度上要么以苏画线，要么以美画线，以至于一些西方的中国问题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居然没有自己的地区政策 (a regional power without a regional policy)，或是一个没有亚洲政策的亚洲国家 (an Asian nation without its Asia policy)。^①

相比之下，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和以和平加发展为主线的独立自主外交，使中国的内外政策都远离西方主义的基本内核，更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中”与“和”的色调。^② 这里所说的“远离”，不是抛弃或决裂，^③ 而是在经过百余年的彷徨、反思、追求和探索之后，中国在其历史性崛起的过程中，能够同时对西方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的不同要素进行评估、筛选和理性借鉴，而不必在不同的西方主义范式之间被迫进行零和式的，而且往往是痛苦的抉择。^④ 换言之，一个稳定、强大的中国，在与西方主义百年“不对称”交往之后，对各类西方主义已经由理性代替激情，正以“和”的姿态与外部世界接轨。

三 国际政治中的“分”与“和”

冷战以后的国际政治却走向另一条道路。1991 年冷战戛然而

① 见 Steven I. Levine, “China in Asia: The PRC as a Regional Power,” in Harry Harding, 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07 - 114; Michael Hunt,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Ibid.*, pp. 1 - 42; Samuel S. Kim, *China in and out of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84.

② David Kang, *China Risi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③ 十年来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转型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方式；而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则是完全抛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体制，以“休克疗法”一挥而就，进入西方自由主义的殿堂。

④ 1919 年的《凡尔赛和约》使中国知识精英对西方自由主义理念的“一厢情愿”破灭，进而转向西方共产主义。1947 年开始的冷战又迫使新中国在两极世界中“一边倒”。